



敦煌 变 文

敦煌讲座书系



李小荣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李小荣 著

敦煌变文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变文 / 李小荣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 11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64-4

I. ①敦… II. ①李… III. ①敦煌学-变文-文学研
究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1729号

出版人: 吉西平

策 划: 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 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 朱黎明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敦煌变文

李小荣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2 插页 4 字数 429 千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5423-2364-4 定价: 65.00 元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 柴剑虹 郝春文 张涌泉 郑炳林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做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敦煌变文研究简史	3
第二节 变文的含义及类别	28
第三节 敦煌变文的特点	33
第二章 变文之流变	39
第一节 早期变文	41
第二节 释家讲经之展开	56
第三节 变文与唱导	88
第四节 唐五代的俗讲与转变	125
第五节 变文之消亡	150
第三章 佛道二教之讲经	169
第一节 佛教讲经	171
第二节 道教讲经	191

第四章 佛道二教之俗讲	215
第一节 佛教俗讲	217
第二节 道教俗讲	244
第三节 佛道俗讲时思想的互融互摄	262
第五章 非宗教类变文	273
第一节 题材类型	275
第二节 精神内涵	302
第六章 变文之表演	323
第一节 表演地点	325
第二节 表演主体	341
第三节 文本类型	351
第七章 变文讲唱艺术之综合性	361
第一节 变文讲唱中的音乐之用	363
第二节 变文讲唱与美术	413
第三节 变文讲唱中的佛教剧本	445
第八章 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459
第一节 内容的影响	462
第二节 文体的影响	477
参考文献	495
后记	505



第一章 导 论

自发现敦煌文献百余年来，变文研究一直是国际敦煌学界特别是敦煌文学研究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变文的含义、来源、性质诸问题的讨论，虽热烈，却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本书的任务，即在总结近百年敦煌变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重加梳理与阐发。

而在《导论》中，主要讲三点内容：一是敦煌变文的研究简史；二是变文的含义及类别；三是敦煌变文的特点。其中，第一点是详述，另两点则为概述。

第一节 敦煌变文研究简史

考虑到学术界一般把变文置于“敦煌文学”的范畴内予以讨论，而对敦煌文学的研究，其成果最为突出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中国，故我们在回顾相关研究史时，主要以中国（含台、港）为主线。

敦煌变文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敦煌学其他的分支学科一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以文献整理、校刊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找出几个关键的时间点，进而将变文研究史大致划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

一、变文作品之零星刊布及对变文含义、来源之论争阶段（1909—1949）

众所周知，敦煌学肇始之初，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少数能接触到敦煌文献资料的地区。于此，敦煌变文的研究也不例外。最早在1909年9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北京向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写卷。这些写卷引起了中国学人的关注，他们立即加以抄录与刊布。特别是罗振玉，在同年9月25日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①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的

^① 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杂纂》，1909年9月25日，第42—46页。

开山之作，也是敦煌文献研究的开篇之作。不过，罗氏此作重在介绍经史（如《尚书》）之价值，并未讨论具体的敦煌文学作品。但随后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1909年国粹堂石印本），罗振玉编印的《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诵芬室刊本）、《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日本宸翰楼影印本）、《敦煌零拾》（1924年排印本），刘复辑录的《敦煌掇琐》^①等，则收录了不少文学作品，有的也包括了后来被称为变文的东西。^②

敦煌变文研究伊始，主要采用的形式是序跋和提要，旨在对相关作品内容与文学史价值进行评述，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③等人即如此。当然，由于他们悉为博学鸿儒，即便提要式的介绍，往往也包含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刻的学术思想。

不过，在“变文”研究初期，学术界对其称名不一，或曰通俗小说，或曰佛曲、唱文，等等，不一而足。^④最早把这一类作品称为“变

^① 是书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于1925年刊行。

^② 如《敦煌零拾》“佛曲三种”中，即有大家熟知的变文作品《欢喜国王缘》；《敦煌掇琐》中则有《丑女缘起》《舜子至孝变文》等。

^③ 具体可参看静庵《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载《东方杂志》1910年第17卷第8号，第95—100页），罗振玉《佛曲三种跋》（载《敦煌零拾》卷四），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跋》（悉收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等。

^④ 参注^③所举相关论文及本书第5页注^①之引文。

文”者，可能是胡适。^①而真正确立“变文”名称并使之发生广泛影响的是郑振铎，他先后发表了《敦煌的俗文学》（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年3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出版部，1932年）、《中国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论著。郑氏的研究，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②比如他曾使用过佛曲、俗文和变文，最后才确立“变文”的内涵。他说：

“变文”的名称到了最近，因了几种重要的首尾完备的“变文”写本的发现，方才确定；在前几年，对于“变文”一类的东西，是往往由编目者或叙述者任意给他以一个名目的。或称之为“俗文”，或称之为“唱文”，或称之为“佛曲”，或称之为“演义”，其实都不是原名。……也皆是出于悬度，无当原义。我在商务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里，也以为这种韵散结合体的叙述文字，可分为“俗文”和“变文”。现在才觉察出其错误来。原来在“变文”外，这种新文体，实在并无其他

① 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有云：“敦煌石室古卷子中，影响于后世文学最巨者，厥为此种渊源于佛教文学之讲唱佛经或故事的变文。……最初介绍此种文体者为罗振玉氏之《敦煌零拾》，内有《佛曲三种》，时尚未知有变文之目，罗氏名为‘佛曲’也。变文之名最早介绍于世者，恐即胡适博士所记之《维摩诘经变文》，而狩野博士抄归之《孝子董永》，今知实亦变文，不过仅存唱词而已。厥后日本冈崎文夫博士又在巴黎抄得《目连缘起》《大目犍连变文》《破魔变文》三种，由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两博士为文介绍于《支那学》中，自是变文之名益彰。继之者为刘复、小岛祐马、郑振铎、王重民、那波利贞诸君，先后续有抄录，而国立北京图书馆所藏变文，嗣已整理完毕。”（载《白川集》，见《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又，本书只是在第一次注释时才详标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及页码，第二次及以后只标注作者、书名与页码）。傅先生的这段文字，一方面是从文献搜集的角度阐述了“变文”名称的问世过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敦煌变文作品的早期刊布，实是中外（特别是中日）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② 关于这一点，吴光正已有归纳，参吴光正《1949年前敦煌文学研究的若干特点》，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第149页。

名称。^①

郑振铎的变文研究，特别体现了史家的眼光，既注重考察变文的历史来源，又重视它在中国俗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作用。^②而且，他针对当时读者不易看到变文资料的现实情况，在论著中还选录了不少变文作品。

20 世纪上半叶的变文研究，除了文献整理与刊布这一基础工作外，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于三大方面：一是变文含义，二是变文来源（当然，这两者也经常交织在一起），三是作品的个案研究。

关于变文含义，学人的争论焦点在“变”，且以为弄清楚了“变文”之“变”，自然就解答了什么是变文的问题。这一争论的高潮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向达、傅芸子、孙楷第、周一良、关德栋等人贡献尤多。^③而且，多数人认为“变”指的是佛教变相。^④

至于变文来源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成两大派：一曰外来说，二曰本土说。而且，还是外来说占主导地位。对此，最先发表意见的是胡适，他联系 5 世纪以下释家宣传教旨的三种方法——转读、梵呗与唱导，从而得出变文源于佛经翻译文学的结论。^⑤嗣后，郑振铎、关德栋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出版部，1932 年，第 590—591 页。

② 郑振铎在论述变文渊源时，深受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影响，主要持印度外来说（参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编校再版本〉，1996 年，第 150 页）。关于变文之影响，参郑振铎《什么叫做“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载傅东华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 年，第 374—377 页。

③ 具体归纳可参看林家平、宁强、罗华庆《四十年代关于变文及“变”字的研讨》，载《兰州学刊》1985 年第 6 期，第 81—86 页。

④ 关于变文变相之关系及变相含义的研究情况，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有更详细的说明，此处从略。

⑤ 参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25—131 页。又，胡适是书原计划写成三卷，但仅于 1927 年写完上卷，次年交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余两卷则一直未能完成。

等人皆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如郑氏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变文》里指出：

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文籍里找到。

我们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地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最著名的马鸣的《本生鬘论》也曾照原样地介绍到中国来过。一部分的受印度佛教的陶冶的僧侣，大约曾经竭力地在讲经的时候，模拟过这种新的文体，以吸引听众的注意。……讲唱“变文”的僧侣们，在传播这种新的文体结构上，是最有功绩的。^①

关德栋在《谈“变文”》论及变文渊源时，则联系于“佛教翻译文学的影响”、“六朝时代佛教的唱导文学”，最后得出结论说：“因为支昙籥输入‘转读’之法，使佛教深入民间。其逐渐演进，遂有中晚唐五代‘变文’之作。”^②

持本土说的代表人物是向达。但他对敦煌俗文学的认识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是从外来说逐渐转向本土说的。1929年，他发表《论唐代佛曲》时指出：“敦煌发见的有韵的俗文学大致可分成纯粹的韵文和韵散相兼的两种。……这两种俗文学大概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所以我疑心《孝子董永》《季布歌》是从《佛所行赞》一类佛教文学蜕演而出。……至于俗文变文之类大约摹仿佛经的体裁，散文即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50页。

^② 关德栋《谈“变文”》，原分载于1946年《觉群周报》第1卷第1—12期，收入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5—233页，特别是第197页。

是佛经中的长行，韵语即是佛经中的偈。”^① 1937年《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里则谓敦煌俗文学在思想方面：“自然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表现得最浓厚，如上举的《叹百岁诗》，就是一个好例。更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原来就是寺院。”^② 1940年以后几经修改的《唐代俗讲考》一文中，他又主张：“俗讲文学之来源，当不外乎两途：转读唱导，一也；清商旧乐，二也。”认为讲经文与变文应该分立，“似以讲经文为正宗，而变文之属，则其支裔。换言之，俗讲始兴，只有讲经文一类之话本，浸假而采取民间流行之说唱体如变文之类，以增强其化俗之作用。故变文一类作品，盖自有渊源，与讲经文不同，其体制亦各异也。欲溯变文之渊源，私意以为当于南朝清商旧乐中求之。”^③

至若作品的个案研究，比较集中于《目连变》《破魔变文》《丑女

① 是文原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1929年10月），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8—285页。此处引文见第282—283页。又，向氏此文的历史价值在于辨明了敦煌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的区别，指出“佛曲”的性质是音乐，而“俗文变文”乃为通俗文学，两者判然有别。

② 是文原载《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号（1937年7月），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34—244页。此处引文见第243页。

③ 是文最早刊登于《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1940年以后几经修改，再发表于《国学季刊》第6卷第4号（1950年1月），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68—327页。此处引文详见第301—303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向达变文之源出于清商旧曲之变歌说，周一良表示了坚决反对，参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载《敦煌变文论文集》，第157—164页。

变》《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伍子胥变文》等，^①采用的多是考究故事源流的方法，这对读者正确理解作品的生成过程深有助益。

此外，由于当时有人认为变文可能源自佛教的俗讲，主张变文或即讲唱经文之话本，由此引发了对俗讲体制、仪式等方面的讨论。比如向达《唐代俗讲考》，就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唐代俗讲的仪式、话本、起源与演变，清晰地勾勒出有关此论题的基本面貌；孙楷第《唐代俗讲之轨范与其本之体裁》，则对俗讲体制给予更加翔实的考证，指出此类作品可别为两类：一曰讲唱经文，二曰变文（转变之底本）；^②傅芸子《俗讲新考》亦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与变相图的配合运用问题。^③

顺便说一下，在中国以外，这一时期的变文研究主要见于日本。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狩野直喜《支那俗文学史研究の材料》（上、

① 重要者如赵景深《目连故事的演变》（原载《银字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铅印本，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457—475页），傅芸子《关于〈破魔变文〉——敦煌足本之发见》（原载《艺文》1943年第1卷第3期，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495—502页）、《〈丑女缘起〉与〈贤愚经·金剛品〉》（原载《艺文》1943年第3卷第3期，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509—517页），关德栋《〈丑女缘起〉的故事依据》（原载1946年12月19日上海《中央日报·俗文学》第9期，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519—521页），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原载《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609—648页），邢庆兰《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彝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原载《边疆人文》第3卷第5、6期合刊，1946年油印本，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695—703页），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原载《小说论丛》，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年铅印本，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705—712页），刘修业《敦煌本〈伍子胥变文〉之研究》（原载1937年6月3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84期，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第527—532页）。

② 是文原载于《国学季刊》第6卷第2号（1937年模印，1938年装订于长沙），收入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42—98页。又见孙楷第《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3页。

③ 是文原载于《新潮潮》月刊1946年第1卷第2期，后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第147—156页。